

5250

出

版

史

料

徐州

CHUBAN SHILIAO

4

出

版

第四辑 目 录

史

料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回忆上海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	朱光潜 (1)
开明书店纪事	王知伊 (3)
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讲录	(25)
范洗人先生开会词	章雪村先生关于店史的报告
马夷初先生演讲词	吴觉农先生演讲词
茅盾先生演讲词	朱季华先生演讲词
叶圣陶先生的答谢词	
半个世纪以前摄下的一张照片	陈梦熊 (28)
人物志	怀念夏丏尊先生
	楼适夷 (30)
站在少年儿童报刊的瞭望台上	陈伯吹 (35)
关于《童话连丛》	贺 宜 (38)
书简	邹韬奋狱中致先父张元济书简
	张树年 (42)
	茅盾致张元济的信札和祝辞
	熊 融 (45)
纪念完造百年诞辰	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
	吉少甫 (48)
	内山完造年谱
	山下恒夫编 沈洵澧译 (54)
	花甲录(选载)
	(日)内山完造著 金 福译 (66)
回忆录	战时的山东新华书店
	宋原放 (72)
	回忆石家庄新中国书局
	毕 青 (77)
	海燕十三年(下)
	俞鸿模 (79)

我和现代书局	施蛰存 (97)
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	吴铁声 (101)
倾盖社与《倾盖周刊》	王家鼎 (111)
中国古典小说与日本内阁文库	杨震方 (113)
解放前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象记(四)	朱联保 (115)

上海租界内中国出版界的实况
(伪上海市政研究会编写) 傅殿文译 (117)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图书审查机关简介 张 钊 (134)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目录(一)
(1938.3—1945.8) 张克明 辑录 (138)

质 补 订
疑 充 正 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印刷附律” 陈正书 (156)

轶
闻
·
书
话

大孚出版公司二三事(王大象)(44) 《中国的一日》补遗(尚丁)(149)
郭沫若《我的幼年》何以被禁?(王树荣)(96) 鲁迅的第一部小说——《怀旧》(阳辑)(110) 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王树荣)(148) 回忆两种现代文学丛书(魏绍昌)(153) 《爱的教育》的几种版本(盛巽昌)(155) 诗集《我歌唱》出版点滴(丁言昭)(150) 上海出版界华北、东北参观团(雨札)(158) 约稿趣闻(知辽)(71) 《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出版日期和不同版本(陈子善)(151) 《爱眉小札》线装影印本(孙继林)(34) 《格林童话》的汉译(兆摘)(37) “润笔”一词最早出处(达摘)(27) 最后的一面(福康)(152) 《语丝》刊名拾趣(遇之)(2) 张元济图书馆在浙江海盐县奠基(文摘)(158) 中国印刷学会(廷洛)(78)

封二：一九四六年十月开明书店举行二十周年纪念时，叶圣陶、王伯祥的献辞手迹
一九四六年上海开明书店同人参观联华影业公司留影

封三：一九三八年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编印的《书刊查禁理由提要》
国民党查禁毛泽东著《论持久战》一书的指令
日本宪兵队在上海查封书店的封条

封面设计：任 意

回忆上海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

朱光潜

一九二二年夏天我在香港大学毕业后，就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英文，才开始接触到“五四”运动在知识分子中间的巨大影响以及左右两派在政治、文艺和教育等问题上的激烈斗争。我听过李大钊、恽代英诸位先烈的讲话，我还在当时由左派支持的上海大学里兼课，和左派青年也有些来往。我因受过长期的封建教育和帝国主义教育，一时还不能转过弯来，总的说来，我在不满现状方面和进步青年是心连心的，但由于清高的幻想妨碍我参加党派斗争。不多时，中国公学中学部在江浙战争中被摧毁了，我由文艺界老友夏丏尊先生的介绍，转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在短短的几个月之中，我结识了后来对我影响颇深的匡互生、朱自清和丰子恺几位好友。匡互生是春晖中学的教务主任，他和无政府主义者有些来往，特别维护教育的民主自由，而春晖中学校长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作风有些专制。匡互生向校长建议改革（其中有让学生有发言权、男女同校等），被校长断然拒绝了。匡互生就愤而辞去教务主任职，掀起了一场风潮。我对匡互生深表同情，就跟他采取毅然决然的态度，离开春晖中学跑到上海另谋出路。离白马湖时有一批同情我们的学生到车站挽留我们，挽留不住，就跟我们一同跑到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有一批教师例如周为群、刘薰宇、丰子恺、夏丏尊等人也陆续转到上海。原在上海的一批文化界朋友，例如胡愈之、周予同、刘大白、陈之佛、夏衍、章锡琛等也陆续参加进来，组成了一个立达学会。我们商定办一所立达学园。先在上海老西门黄家阙租了几间破房子马上开课，同时在江湾筹建校舍。我们都是些穷书生，白手起家办学校，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着筹经费和争取社会支持，我曾陪匡互生找过上海的湖南大资本家聂芸台，文化界要人吴稚晖，还专程跑到北京找过当时的教育部长易培基和教育部参事黎锦熙。

不久，江湾校舍建成了，我们就迁到江湾，以立达学会的名义宣布了创办立达学园的宗旨。这份宣言是在匡互生授意下由我执笔的，公开提出了教育独立自由的主张。叫做“立达”也有深意，来源于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两句话。“立”指脚跟站得稳，或立场坚定，“达”指通情达理，行得通。在“立”与“达”两方面，“人”与“己”有互相因依的关系，“成己”而后能“成物”，做到成物也才能真正地成己。这是“解放全人类才能真正地解放自己”这一深刻的辩证思想的朴素表达方式，我们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当然还茫然无知。叫做“学园”而不叫做“学校”，是要标明我们的“学园”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学校。这个词当然联想到希腊的“柏拉图学园”的自由讨论的风气，但是更切实的意义是把青年当作幼苗来培养和爱护，使他们得到正常的健康的成长。此外，我们还有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用意，准备由学园师生开垦一个农场，后来这个愿望也实现了。立达学园附近有一所劳动大学，这二者是有直接联系的，主持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

立达学园的教育自由的思想 and 作风，在当时北洋军阀淫威专制令人窒息的情况下，传播了

一股新鲜空气，所以对进步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都争先恐后地来就学。在一些辛勤的园丁培养之下，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后来在各自的岗位上成了无名英雄。例如现在主持浙江省文联的黄源同志，他以研究鲁迅闻名，在文化界做过不少工作。黄源同志和我几十年阔别之后，去年在文代会上重逢，还亲热地呼我为“老师”，其实他自己也已七十六岁了，我比他还够不上“十年以长”。他叫我“老师”，我既感到惭愧，又感到欢喜，这是一个老园丁的至上酬劳。

立达学会同人还筹办了开明书店。我们的目的是争取青年中学生，因为他们是社会中坚。所以开明书店从开办之日起就以青年为主要对象。我们首先出版了一种刊物，先叫《一般》，后改称《中学生》。在编辑方面出力最多的是夏丏尊和叶圣陶。“开明”就是“启蒙”，这个名称多少也受了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运动的影响。《中学生》这个刊物当时是最受欢迎的，除介绍一般科学知识和发表文艺作品之外，夏丏尊和叶圣陶两位主编特别重视语文教育方面的问题，曾特辟“文章病院”一栏，以具体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当时官方报刊的公文和社论的思想和语文的毛病所在以及治疗的方剂。这不仅讽刺了官样文章及其所表现的思想，也对当时的文风和学风乃至语文教学都起了难以估计的保健作用和示范作用。这个“文章病院”至今还令我特别怀念。因为现在语文在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上的一些老毛病依然存在，而病院和医生却不易找到。如果现在那么多的报刊也多办几所“文章病院”，少发些公式教条的空论，这对文风和学风都造福不浅。

一家好书店或一种好刊物不仅出版一些好书、刊登一些好文章，还会培养出一些好作家和好编辑。开明书店除《中学生》这个刊物之外，还出了一些深受青少年学生欢迎的课本、文学作品和一般读物。我还记得丰子恺为开明的出版物作了一些插图，自画自刻，在漫画和版画乃至编辑方式的发展方面都起了推动作用。巴金和夏衍等著名作家的早年作品大半是由开明书店发表的。此外，还有些科学家如刘熏宇、顾均正、周予同等人也都是从开明发迹的。就我个人来说，我应特别感谢开明书店对我的培育。我在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几位老友的言教和身教下才开始放弃文言文，学写白话文。我在留学英法八年之中一直和开明维持着密切的联系。一到英国，我就不断地替《一般》和《中学生》写稿，后来由夏丏尊搜集并作序的《给青年十二封信》这部处女作就是由开明印行的。这本小册子现在看来不免幼稚可笑，在当时却成了一部最畅销的书。原因大概在我反映出当时一般青年小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在彷徨失望中摸索出路。从此我和广大青年建立起了友好关系，也不再愁写出文章没有地方发表和没有人看了。我在外国当学生时代写的几部主要的著作（《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变态心理学派别》）都是由开明书店印行的，所得到的稿费大大减轻了为官费经常扣发的情况下一个穷学生必然要面临的灾荒。所以想到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我总是怀着感激的心情。

（原载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日《解放日报》）

《语丝》刊名拾趣

《语丝》周刊创刊于一九二四年，它的刊名的来历，颇有趣味。当时，为了给周刊取个名字，几个撰稿人聚在一起，随便找来一本书，任意翻开，由一人用手指点下去，被点到的，就成了刊名。这段趣闻，似乎也从侧面反映了《语丝》崇尚自由与趣味的

倾向。不过，《语丝》作者的意见与态度不尽相同，鲁迅评价它们说：“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

（遇之）



开明书店纪事

王知伊

(一)“五四”运动的产物

一九八二年是我国出版史上值得一写的年份，有三个大书店分别开了纪念会。这就是三联书店(前身是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从事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周年纪念，和商务印书馆创立八十五周年、中华书局创立七十周年的纪念。在三联书店的纪念会上，陈翰伯同志致开会词中说：“我们希望出版界都来总结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经验，发扬在国民党统治区和老根据地解放区战争环境中创办和发展革命出版事业的革命传统。还要吸取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从事出版工作的有益经验，进一步做好出版工作。”陈翰伯同志在这里提到了开明书店，认为她立店以来，也有一些从事出版工作的有益经验。这给开明书店旧同人以很大鼓励。我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日子不算太长，回忆这一段时期和从开明前辈那儿听到的，感到确有不少值得记述下来的地方，可供今人和后人参考。也听到同志说，商务、中华等都有一些资料积累，而独独你们开明书店很少，连回忆开明的文章也不多见，这很叫人遗憾。这也说的是。为此，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执笔为文，以就正于关心文化教育出版事业的同志们。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曾指出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

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文化出版事业，按其广义来讲，实际上也是一种教育事业。这种新、旧出版业之间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宣扬封建文化的旧出版物与宣传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出版物的对立和斗争。商务印书馆创立于戊戌政变前后，中华书局创立于辛亥革命时期，她们都以自己的出版物适应了发展中的时代潮流，因之，奠定了她们在文化出版史上的地位。开明书店立店于商务、中华之后，她诞生的历史背景不同于商、中。她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产物。

开明旧同人宋云彬同志曾在《开明旧事》(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文中说：“开明的产生，完全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没有‘五四’运动就不会有人提出妇女问题来讨论，那么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先生，就不会因谈新性道德和办《新女性》杂志被商务印书馆解职，他将一辈子在商务当个编辑；而同时在‘五四’以前，象开明这样的新型书店根本办不起来，即使办起来了，也不可能发展，更不可能长期存在。”章锡琛先生自己也说：“当我主编商务的《妇女杂志》时，在‘五四’以后的思想运动中，妇女问题也成为当时热烈讨论的一个部门。”“对《妇女杂志》的议论和主张，越来越激烈了。我的杂志渐渐被认为怪癖了。”结果是他辞去了该杂志的主编，由吴觉农同志出面，办了《新女性》

杂志，离开了他工作已十五年的商务。（见开明内部刊物《明社消息》第十九期，章锡琛：《一个最平凡的人》）宋、章两位的叙述，具体地说明了“五四”运动正是诞生开明书店的思想摇篮，没有“五四”运动，也就没有开明书店。

“不过，话又说回来，‘五四’运动时代的新书店，不仅只有开明，当时可以当得起一句成语，所谓‘雨后春笋’，举例来说，象北方的朴社，南方的钟山、泰东，以及现在上海还有几家不三不四地在支持拖延着的书店。……只有我们的开明仍旧强健的存在着发展着，静静地想，真不容易啊！”（见《明社消息》新一号，周予同：《谈明社总社》）这是开明另一位老同人周予同先生说的话。周先生对开明感情深，《明社消息》又是个内部刊物，因此言下有独尊一家的味道，这是不一定正确的。但是，周先生说的“五四”运动后的新书店为雨后春笋，为什么开明书店独能得到较长时期的存在和取得事业上的较大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是可以探讨，也应该探讨一番的。本文无意从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仅想从她的创店、从业人员、图书出版、经营管理等方面作些阐述，对她从“纵”的和“横”的方面略于解剖。但是，作者也是开明同人之一，苏轼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否能够正确地描绘出开明的一个基本轮廓来，那只有请读者自己明智地去判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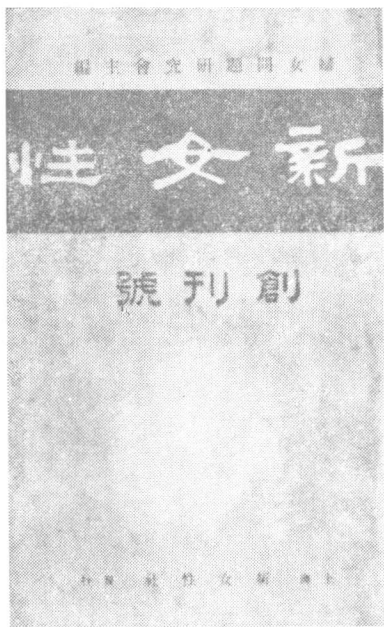
（二）从兄弟书店到大书店

章锡琛在商务被王云五辞退以后，在章

的商务同事郑振铎、胡愈之等人的怂恿下，另编《新女性》月刊，用新女性杂志社名义发行，发行地址即在主编兼发行人吴觉农的家里（上海宝山路三德里）。按照商务惯例，辞退职工有一笔退俸金，章锡琛大概拿了一、二千元的退俸金，即以此作为本钱，用妇女研究会名义，编印妇女问题研究会丛书，如《妇女问题十讲》、《新性道德讨论集》等。郑振铎又把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周刊》和文学周刊社丛书交给新女性杂志社印行。这样，书愈出愈多，销路也不错，只是资金太少，业务开展较困难。章锡琛就求援于他的胞弟章锡珊。章锡珊是由他的哥哥通知他考进商务去当“账房”（会计）的。那时，他正在奉天（沈阳）商务印书馆工作，平时自奉极俭，积蓄了一笔钱，他就把这笔钱给了他哥哥。章锡珊在《明社消息》第二十一期《自我介绍》中对此作了这样的叙述：

“在奉天工作，除了本份工作以外，每每不自量力地从旁顾问营业的事，觉得他们同业间的营业竞争，手段太卑劣了。奉天分馆换了经理，方法更甚。那时哥哥创立了开明书店，我已把所有的积蓄给了他，因为营业上没人主持，我终于决然辞职，携了妻和五个儿女回到上海。”至此，章氏兄弟正式办起了兄弟书店。按章锡琛离开商务后办新女性杂志社的日期算，应为一九二五年八月，但以章锡珊南下与他哥哥合营，在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六十号正式挂起“开明书店”牌照来说，

那是一九二六年八月间。这里，在时间上相差一年，据解放后由开明书店向出版总署写的“报告”中说：“我店的前身是新女性杂志



开明书店出版《新女性》的书影

社，由章锡琛创办。”由此看来，开明书店的创店年份，可以上溯到一九二五年八月，因为那时候的新女性杂志社，即为事实上的开明书店。但是后来开明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六年分别进行过创店十周年和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所以开明的正式创店日期，应以一九二六年八月为准。

开明书店在章氏兄弟合营的时期，资金大概是五千元左右。工作人员也少，一共不过四、五个人。担任编校等工作的有赵景深，钱君匋、王蔼史(女)和索非等。开明的业务发展很快，不到一年光景，六十号这一幢兼作住宅、宿舍、编辑所、发行所的房子，已不够用了，加租了隔壁六十四号的房子，编校方面添加了王燕棠、汪曼之(女)和陈云裳(女)。出书范围逐渐扩大，有文学读物、青少年读物、歌谱、少量的教科书以及风行一时的《活叶文选》等。在期刊方面，除《新女性》杂志外，还接受出版了立达学会的同人刊物《一般》。这个杂志提倡杂志文体趣味化，先后由夏丏尊、方光焘、刘叔琴、刘薰宇等负责编辑。

这一段时期，在开明书店写给出版总署的“报告”里称为“合伙经营时期(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八年，由夏丏尊、刘叔琴、杜海生、吴季候、丰子恺、夏贷均、胡仲持、吴仲盐共同发起，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二九年公司正式成立，资金为五万元。一九三〇年增资五万元。一九三一年增资十万元。一九三三年增资五万元。一九三六年增资五万元。共计股本三十万元。其后，因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币”贬值，一九四四年在桂林增资为“法币”六百万元。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增资为“法币”一亿元。一九四七年增资为“法币”三十亿元。综观开明书店历次增资情况，为数都不大。探索其原因，似可说明三点：一是开明的业务逐渐兴旺，原有资金已与发展中的业务不相适应。二是与开明友好的熟人，多数是知识分子，要集合较多的资金有困难，加之

开明安守本业，不搞任何投机活动，金融周转不灵，更使经济困难。三是开明的主持者们都比较小心谨慎，故除抗战前一次增资十万元外，余均每次只五万元。增资中的一部分是请作者以版税所得，转为股金。这样，既可使流动资金减少，又充实了资本，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由于章氏兄弟在资金周转调度方面的能量不大，因此，开明的总经理一职，先由杜海生担任，章锡琛任协理。杜去职后，章自任经理，另请范洗人担任协理，以弥补其不足。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由范任经理，聘请朱达君担任襄理，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这时候的开明书店，规模日大。她的编辑机构迁至虹口梧州路，发行所先从宝山路迁到旧上海书业集中的地区望平街，又从望平街搬到福州路，与中华书局相对面，俨然是一家大书店了。开明在福州路成立门市部是一九三二年一月，章锡琛聘请谢家崧为门市部主任。开明的“报告”里，称这一段时期为“正式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时期(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年)”。

在这段时期里，先后主持编辑业务的是夏丏尊先生和叶圣陶先生。由于这段时期长，并且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次动荡的年月，因此有关开明的编辑出版、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情况，留待下文详述。但在这里，必须补述这样一个事实，即开明之被公认为大书店，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它出版的教科书为书店打开了局面，解放前全国不少中、小学校都采用开明的教科书，这不仅使开明赚了钱，而且扩大了影响，甚至最后能和商务、中华、大东书局、世界书局与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一起组成出版发行教科书的集团(实为“托辣斯”)，从此被认为全国的六大书店之一。

(三)在时代的风浪里

开明书店从家庭手工业式的兄弟书店，发展为全国六大书店之一，道路不平坦，经历的艰险不少，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损失惨

重，在其后的解放战争时期，也遭遇到一定的困难。

先说抗战时期。

抗日战争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存亡。从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打响第一枪开始，历时达八年之久，才告胜利结束。在“七七”之前，国民党反动派坚持所谓“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这个反动政策，导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不断侵

略，引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愤慨。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才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收起那个祸国殃民的政策。在此形势下，开明书店的主持人如果能对战争的爆发有所准备，先作些必要的措施，那么，至少可以减少一些损失。可惜的是，章锡琛不大关心时事，夏丏尊不相信蒋介石政府会跟日本人打仗。这样就造成了后来的处处被动，致使开明书店在这次战火中，资金损失竟占全部资产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南京的“教育部”召集上海各书店经理到南京去开会，宣布战争不可避免，要各家赶快把机器和重要物资搬离上海，并说政府已在武昌安排设厂地点，还准备了运输船只，要各家立刻着手搬迁。章锡琛第二天回到上海，就准备搬迁。但开明自己没有汽车，靠临时雇用大卡车搬场，这已够呛的了，可恶的是国民党政府原说准备好的船只，此时已拨去运兵，历经交涉，总算弄到两只民船，分两批开船。第一批运的是纸型、书籍和纸张，先到镇江，后以英国轮船运汉口，幸安全到达。第二批运的是几部机器（向一家印刷厂借来的），还有纸型、书稿、纸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开明同人摄于桂林

张、油墨等，在镇江白莲泾附近被日本军队劫走了。章锡琛到了武汉，去政府办事处交涉，要他们实践南京开会时的诺言，结果，一无所获。在他气愤之际，传来了第二批货物被日军劫走的消息，又接上海电报，说店屋因欠房租，房东已经起诉，要遭封闭，他就回上海了。从此，他一直住在上海，直到抗战结束。夏丏尊、王伯祥、徐调孚等人也一直住在上海。日寇侵入租界后，开明书店曾一度遭到日寇的封闭。章、夏曾被日寇抓去关押过十多天，经日人内山完造的营救，才放了出来。在上海成为“孤岛”时期的开明书店，由于总店已全部被火毁，编辑所无形解散，编辑人员大部留职停薪，只留下极少数的创店时期人员，支一点极少的生活费。他们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

在这场劫难里，开明书店的损失十分惨重。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开明书店的编辑、出版、发行部门以及为开明书店承印书刊的美成印刷厂，全部被日寇的炮火轰毁。其中重要书稿、纸型不少，《二十五史》锌版，全部被毁。九月下旬，与章锡琛一起去汉口的还有范洗人、叶圣陶和汉口分店经理章锡舟。

他们想在汉口重起炉灶，成立编辑部，并约唐锡光、汪允安、章嘉禾、刘文范、金韵锵五人到汉口，进行工作。这五人到了汉口，得知第二批货船遭难，无事可做，即被遣散。章锡琛回沪，范、叶诸人则径行去渝。他们对于开明的前途，还抱着希望。年底，南京被围，武汉人心浮动，在上海的夏丏尊、王伯祥写信劝叶圣陶回沪。叶圣陶在复函中说：“承嘱回沪，颇加考虑。沪如孤岛，凶焰绕之，生活既艰，妖氛尤炽。并欲离汉，亦由斯故。……近日所希，乃在赴渝。渝非善地，故自知之。……出版之业，实未途穷。”叶圣陶信中说的“出版之业，实未途穷”，就开明书店本身来说，在遭受到那样惨重损失之后，可谓“山穷水尽疑无路”了，后来却真的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

范洗人、叶圣陶、章锡舟去内地以后，一九四一年范洗人先将开明总管理处设在桂林，然后立足于开明重庆分店，企图在内地复兴开明。叶圣陶暂时脱离了开明，曾去乐山、成都等地执教。章锡舟后来就任成都分店经理。章锡珊也已来到重庆。武汉沦陷后，大部分文化人集中于广西桂林。开明老同事傅彬然、宋云彬原在郭沫若同志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这时也去了桂林。他们虽然均已离开开明，但仍关心着开明的事业。当时在桂林的开明旧同人还有丰子恺、贾祖璋、唐锡光、王鲁彦、张梓生等。那时，上海的科学印刷厂也搬到了桂林，桂林的印刷条件比重庆好，于是他们建议开明先把《中学生》恢复起来，改名为《中学生战时半月刊》。一九三九年五月，这个刊物决定由叶圣陶主编，宋、傅、贾、唐做实际编辑工作，正式于桂林复刊。范洗人、章锡珊后来也到了桂林，那时开明经济已开始复苏，为进一步开展工作，即明确范洗人当开明的总经理，并重组董事会。桂林分店的经理则为陆联棠。一九四三年，傅彬然重回开明书店工作，由于编辑力量薄弱，约请了在中学里执教的覃必陶和我一起参加工

作。记得当时在开明的早期旧同人不多，仅唐锡光、陆联棠、章士敦、顾惠民、胡瑞卿、金韵锵、王清华等人而已。一九四四年，日寇进犯湘桂，开明预为之计，事先作了较为妥善的安排，损失不大。总店迁渝。

重庆开明书店的总店编译所，仍请叶圣陶回来主持。当时的编辑出版部门，加起来仅约十人左右，可是就在这段时期里，也出版了不少新书，如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蒲韧（胡绳）的《二千年间》等，还维持了《中学生》与《开明少年》二个刊物的出版。重版的开明各种教科书，更为开明赚了不少钱，增添了资金。因此，有的同志回顾这一时期说：自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是开明的复兴时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下午八时，日本投降消息传到重庆。第二天从报纸上得到证实。八年抗战，从此结束，在渝的开明同人，无不欣喜若狂。当时开明的主持人范洗人在如何做好复员工作的问题上，异常焦急，希望立即与隔绝消息的上海及东南区取得联络，安顿西南各分店，恢复沦陷区各分店，其他如资金怎样调度，人员怎样派遣，真是千头万绪，一时难于作出合理安排。经过范洗人、章锡珊、朱达君等人的商议，作了一些有力的措施。如先与上海取得联系，要在上海的章锡琛等人作复兴准备。九月初，派朱达君、金韵锵随带纸型、金钞先行东下，备上海印刷新书。再派刘甫琴经贵阳去长沙恢复分店。范洗人于十一月初到上海后，徐炳生从上饶到杭州成立分店。钟达轩去南京成立分店。顾惠民在汉口筹建分店，后由胡瑞卿接替成立分店。当时，北平分店、广州分店也分别由王稚圃、陆联棠恢复成立。这样开明的各地分支机构，已大致恢复到战前状态了。

一九四六年一月下旬，开明在渝同人，由叶圣陶率领，乘船东下，二月间到沪，二月下旬，召开特别业务会议，议定出版方针，编制营业概算，确定全国营业网。因此，又在台

湾、开封、南昌、福州、沈阳等地设立了分店、办事处。全国共计有十六个分店，比战前增加了十个。此外，在福州路上以高价顶进了一间门面房屋，加建升高了福州路弄内的房屋，在虹口有恒路租赁了货栈，清理逐年账务，结算、发放版税，召开临时股东会等等，可谓百废俱兴，忙得不亦乐乎。遗憾的是，夏丏尊先生却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不幸逝世了。他在病危中看到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接管上海时的种种胡作非为，中国人民仍旧处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因而发出了“胜利，到底是啥人胜利?!”的沉痛感叹。

开明的“好日子”过得不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国共两党和谈破裂，接着而来的是三年解放战争。在这次战争期间，开明直接承受的损失很小，但由于营业区域逐渐缩小，“老法币”、“金圆券”一再贬值等问题，使“似已筑成的小康基础”又发生了危机。危机来自四个方面：一是造货成本高，售价却因币值的一再迅速贬落而不能相抵。二是要多做生意，必须放账，多放账利息拆蚀，吃亏大，不知如何是好。三是因战事，不少地方邮路常断，运输不畅。四是所谓“国定本”教科书问题，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原由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文通、正中七家专营教科书的方式予以废除，谓之“开放”。自此引起了书业间的剧烈竞争，尤其是“新五联”（大中国、新亚、北新、广益、中联）和原来的“七联”竞争得很厉害。“七联”中各家又各自为计，彼此间施展各种手法。开明的经济力量不够雄厚，感到难以应付。当时的襄理朱达君、卢芷芬两人都认为在国定本问题上同业“滥拆放账，不择手段，追随应付，额烂头焦”，确是实话。对这四个问题，虽然一再计议，提出些对策，但处于战争年代，主观上的努力极为有限，所以，尽管范洗人大声疾呼“出版业之前途风暴正多，希望同人同舟共济，度过危机”，另外又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改进出版物质量问题，开放门市，兼售非开明出版的图

书，尽量不放账等，但收效均微，直到全国解放之前，开明始终处于半死不活的尴尬局面中。这种局面的改变，对于一个比较正当的文化出版机构来说，那只有等待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蒋家王朝的彻底覆灭。舍此以外，可谓别无出路。欣幸的是：这个日子不远了，就在眼前了。

（四）新生和归宿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随之是全国范围的解放，蒋介石政府滚到了台湾。开明书店面临了一个崭新的形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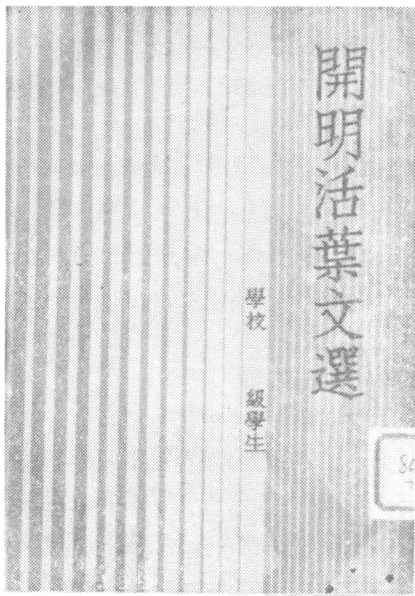
开明在上海解放以后，也成立了工会。一九四九年八月间，仿照各工厂“厂务管理委员会”的办法，店方邀请工会代表组织了“店务管理委员会”。重新修订了行政组织系统，在业务分工上较前更为明确。一九五〇年，开明书店向国家的公私合营的申请，很快得到了出版总署的批复。为了迎接“公私合作经营”和全国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召开，开明于六月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各单位负责干部会议”，到总管理处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地分店经理等约三十余人。在这次干部会议上，胡愈之署长亲自出席讲话。代表政府来开明工作的沈静芷同志也曾作了简单的讲话。章锡琛则代表开明书店董事会在开幕式上作了“开明书店的新生”的讲话。

章锡琛先简单地回顾了开明从创办以来的



开明书店出版《中学生》的书影

历程，然后提出为了做好自己的出版工作，必须铲除两种心理状态：一种是自卑的心理，一种是自大的心理，前者说的是不要以为自己过去没有直接参加革命工作而自卑，后者不要以有较多的业务经验而自大。他还提出要消除三种观念。这三种观念，即依赖政府的观念，靠教科书吃饭的观念和劳资对立的观念。他说：“解放以后，许多同志都感到营业的衰落和开支的庞大，担心开明书店的前途岌岌可危。现在知道出版总署准许公私合作经



开明书店出版《开明活叶文选》书影

营，就认为已经有了靠山，从此可以高枕无忧。这好象把公私合作经营看作观世音的杨枝甘露。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出版总署因为开明以往在出版事业中颇有贡献，所以才准许，由国家予以协助和指导。倘使认为一切可以依赖国家，大家不必再要努力有所贡献，那也就决不能希望得到国家的协助。”这段话讲得很好，是对当时开明同人的有力针砭。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开明书店向出版总署作了一个“报告”，比较全面地汇报了开明自创店以来的历史，并提出了在图书出版等方面的打算。由于开明书店一直以出版中学教本和中学生课外读物为主，因此，出版总署于一九五五年四月批准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正式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书店在新生之后，终于得到了光荣的归宿。

（五）“开明人”与“开明风”

当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叶圣陶同志曾赋诗一首，并以全体同人姓名笔画多寡为序，签名后铸于一铜牌上。诗云：“书林张一军，及今二十岁。欣兹初度辰，铸金联

同辈。开明夙有风，思不出其位。朴实而无华，求进弗欲锐。惟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此风永发扬，厥绩宜炳蔚。以是交勉焉，各致功一篲。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这首诗中提到了“开明风”和“开明人”。“风”是“人”创造出来的，所以让我先在这里说说“开明人”。

何谓“开明人”，顾名思义，说的是开明书店的同人。这个“同人”，除掉在店的职工是理所当然者外，还应包括曾在开明工作，以后离店的一些工作人员，甚至还可

涉及社会上对开明书店颇为友好，且有所影响的一些人士，他们有的是开明立店时的赞助人，有的是开明的作、读者，是开明的老朋友，开明这个事业的热心的支持者。

话，仍得从开明创店时说起。

在开明创店以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个比较著名的学校，教员中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四人都支持新文化运动，在校内外有较大影响，因有“四大金刚”之称。他们四个人后来各有自己的归宿，除有关李次九的情况不了解外，其他三人都或多或少与开明有些关系。即以刘大白来说，他和章锡琛是同乡，在他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的时候，适值开明与世界书局大打官司，他就曾帮过章锡琛的忙。四人中和开明关系最深的是夏丏尊先生。夏是一个为人正直、诚朴的教育家，他在一九二七年进开明后一直主持编译所的工作。夏曾在浙江上虞白马湖办过春晖中学，后来又和匡互生等人一起办立达学园。当时在春晖中学、立达学园任教的人有朱自清、方光焘、刘薰宇、朱光潜、刘叔琴等，后来都和开明关系密切。据《立达半月刊》第十三、十五期载：以立达学园为基地的“立

达学会”，“认定叶绍钧、荣渭阳、周建人、叶吉廷、章锡琛、陈宅桴、郑振铎、蒋爱真、张书绅、王伯祥……为会员”，为讨论添设文学专门部问题，并推定郑振铎、王伯祥、胡愈之、李石岑、周予同、章锡琛、周建人、刘叔琴、刘薰宇、方光焘、丰子恺、夏丏尊、叶圣陶等为筹备员。叶圣陶又为该会会刊《一般》的责任编辑之一。从以上这些人中，可以看到他们中间很多人与开明书店关系十分密切，而在开明立店之前，大家都已熟识了。继夏之后主持开明编译所的叶老，正是通过立达学会的关系和夏丏尊、章锡琛相认识的。章锡琛还曾说过：胡愈之是开明书店的实际创办人，开始的时候，完全靠着他的筹划。夏丏尊跟开明书店发生关系，也完全是胡愈之的力量。胡在“八一三”前夕，并一直给开明编辑《月报》。这些事实，可以说明，开明书店的创业人员和赞助人员中，不少是立达学会的人。立达学会会员是构成以后的“开明人”的一个重要来源。

“开明人”的第二个重要来源是“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发起人计十二人：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其中与后来的开明书店关系密切者有叶绍钧、郭绍虞、耿济之、沈雁冰、孙伏园、郑振铎等，如叶、郭曾在开明编译所工作，沈、耿等为开明重要的著译者，而孙伏园与章锡琛是同学同乡好友，开明书店最初的那块招牌上的四个大字，还是孙伏园的手笔。再查看一下文学研究会会员名单中，和开明关系较深的人那就更多了，如朱自清、周建人、谢冰心、王伯祥、陈望道、赵景深、王鲁彦等，而章锡琛本人，也是该会会员。文学研究会会员中，不少是著名的作家，他们实际上是开明书店的一支重要的作者队伍。

“开明人”的第三个来源是商务印书馆的一批同事。叶圣陶在《我和商务印书馆》（载一九八二年《文摘》第四期）一文中曾说“商务的

编译所是（当时）知识分子汇集的地方，人员最多的时候有三百多位”，“稍后创办的几家出版业如中华、世界、大东、开明，骨干大都是从商务出来的。”这确是事实。开明除创办人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外，曾先后由商务转为开明编辑工作人员的有叶圣陶、周予同、徐调孚、王伯祥、金仲华、宋云彬、郭绍虞、顾均正等，他们中间有的几十年如一日在开明工作，有的也不是一脱离商务就直接进开明的，在开明工作的时间也长短不一，但他们都对开明书店有深厚的感情，关心着开明这个事业。另如茅盾、胡愈之、周建人、郑振铎、顾颉刚等，尽管他们没有在开明工作过，但是他们和开明书店的几位主持人都有深厚的友谊。

“开明人”的第四个来源不象上面所说的三方面人士那样单纯。我进店以后，发现开明同人中相互之间有原先为某一机构同事，原先为朋友、同学、同乡、师生、亲戚等种种关系的不少，到开明书店后期，在经理部门中沾亲带故的更多。这里只就编辑部门来说，如叶圣陶和王伯祥、郭绍虞是苏州小学时代的同窗好友、夏丏尊与丰子恺、傅彬然、贾祖璋等在浙江第一师范有师生之谊，叶圣陶与赵景深、丰子恺等为立达学园同事，唐锡光是顾均正的学生。当然，也有一些同志是被邀请进店的，如吕叔湘、覃必陶、朱光暄等。此外欧阳文彬原在新知书店工作，在该店被反动当局迫害停业后，由傅彬然介绍进开明；而我则是由浙大时的老师丰子恺介绍与傅彬然认识后，由傅介绍进店的。经过考试和自荐后经同意进编辑部门工作的，有卢锡畴、许彦生、孙平等人。像吕叔湘、覃必陶和我们这些人，由于原先与开明的关系不密切，所以有所谓“客卿”的称号。但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与“开明”志同道合，所以与开明老同事都相处得不错，也能和衷共济。真正的“客卿”，事实上并不存在。

以上这四部分人，事实上是编辑队伍与作者队伍。尤其前三部分人，在社会上有学

术地位，是各方面的专家。而夏丏尊、叶圣陶、王伯祥、顾均正、傅彬然、贾祖璋、丰子恺、赵景深等，他们既是严谨的编辑工作者，又是文学、艺术、史学、教育、化学、生物等各学科的名家，正因此，开明书店不乏稿源，书稿质量也高。我记得抗战胜利后上海有一家方形小报，曾把开明的编辑、作、译者称之为“开明派文人”，当吕叔湘先生来店工作后，那家小报竟说“开明派文人又添大将”，郑重其事地作为一条新闻来写。这固然是由于叔湘先生的学术声望，但也可以说明“开明人”确已成为一个无形的文人集合体，受到社会上的瞩目。

讲了“开明人”，对“开明风”就容易说清楚了。那么到底什么是“开明风”呢？叶圣陶在给开明同人组织“明社”写的一首社歌中说：“开明风，开明风，好处在稳重。处常足有馀，应变有时穷”。还在开明二十周年纪念会时说：“开明夙有风，思不出其位。朴实而无华，求进弗欲锐。惟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傅彬然也曾对开明同人的优缺点进行分析，他认为：优点是做事认真负责，开明同人的生活态度一般是严肃的，对工作是一丝不苟的。大家都勤勤恳恳，刻苦耐劳。对业务都比较熟练，工作效率高。对政治上的大是大非，一般同人能够明辨。缺点是：一般只了解出版业的文化意义，缺乏对政治意义的认识。总是力求书稿内容的完善，不能掌握时间以适应社会需要，以及比较守旧等。叶、傅两位先生的分析，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再参照顾均正、唐锡光先生等对“开明风”的有关论述，大胆归纳如下：

（一）开明书店不把出版图书仅仅看作是“人类文化财富的积累和传播，而是作为一种有效的教育工具、教育事业来对待的。”惟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正确无误地表达了开明同人的意志。

（二）开明同人的工作态度比较严肃认真，把出书工作当作一种事业来办，“思不出

其位”，从来不搞投机，以求非分之财。

（三）无论在编辑业务和经营作风上，“稳”字当头，因此，遇到突然发生的重大事件，往往感到一时难以应付，处于被动地位。

（四）店风比较朴实，无论在约稿、审稿，以及在撰写图书广告、经营、管理等方面，均力求实事求是，无哗众取宠之意。同人的生活作风，一般也均较朴实。

（五）在政治上不敏感，趋向温和，但在事实面前能明辨是非，有正义感，对国民党蒋家王朝是憎恶的。正因如此，所以主持开明编辑工作的叶老和傅彬然先生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联袂去香港，转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

我以为开明书店之所以能在书林中自成一帜，这与开明的有比较独特的风格是分不开的。至于叶老说的“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对于今天还在世的开明同人来说，将永远是值得记取和发扬的。

（六）《活叶文选》与 《中学生》杂志

开明书店从成立起至上海解放，历时二十余年，共约出版书刊一千五百种左右，平均月出新书五、六种。抗战前的二三年中出书较多，平均月出约十种左右。到上海解放之日为止，实际上还在印行的约有六百种（据《开明书店报告》）。对这些书刊的内容和出版情况，不可能一一予以评述。这一节只谈《活叶文选》与《中学生》杂志，兼及其它刊物。

《活叶文选》是在开明立店之初，由章琛先生创办的。这是开明的一个创新，它选择历代名篇，分段标点，折迭成帖，无奇零的散页，编上号码，单篇出售，可以任意选购。大中学校都选购去作为讲义或课本，因此销路极好。到抗日战争爆发，《活叶文选》已经印出一千多篇。那时候，开明栈房里专有一间

楼屋，放置《活叶文选》，同人戏呼之为“文选楼”。可惜的是，纸型在抗战时期全部被毁，不能再印。自开明印行《活叶文选》后，书业中多有仿效的。开明书店做了这件好事，不仅有益于读者，对它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学生》杂志的前身是《一般》。这是以中学生为读者对象的，指导文化学习的定期刊物。一九三〇年创刊，由夏丏尊、金仲华等主编，至“八·一三”战事发生止，共刊行六十五期而休刊。一九三九年五月，在桂林复刊，改名为《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由叶圣陶、傅彬然等主编。抗战结束后迁回上海，截至解放时止，与半月刊合计，共出版二百十一期。从二百十六期起，改名为《进步青年》，由张明养等主编，性质无大变动。到一九五二年三月，又恢复原名。这个刊物现在还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继续出版中（一九六〇年后曾停刊过）。

《中学生》杂志既以指导文化学习为主，因而是中学生较理想的课外辅导读物，它的内容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以对中学生的处世态度、学习态度、认识是非标准等立论的“卷头言”，实为每篇千字左右的短论，大都由编者自己执笔。其次为中学各学科的辅导文章，包括作为政治学习内容的时事述评。执笔者多为国内各学科的专家、学者，文字朴素平实，绝少浮言虚语，这类文章约占每期内容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第三为中学生来稿，这是杂志联系读者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读者的一个重要方式。曾先后辟有《青年论坛》、《青年文艺》、《读者之页》等专栏刊登来稿。当时《中学生》杂志在文化知识和思想教育方面，对青年读者有较大的影响。无怪乎当抗战时开明总店刚站住脚的时候，就首先把《中学生》恢复出版了。

《中学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要从正面去教育读者学习马列主义，宣传社会主义革命，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实际的，只能

旁敲侧击地指出当时社会上哪些言论或主张是错误的，哪些言论和主张是正确的，让青年们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不致于受欺骗而误入歧途。不过，就是要做到这点，也极不容易。比如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学生》曾要求以作者笔谈的形式，邀请一些作者回答某些问题，例如这样一个问题：“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中学生）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提这个问题，目的就在于指导青年认识时代。而鲁迅先生回答得好：“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这就告诉了中学生读者，现在是一个缺乏言论自由的时代，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压制民主自由的专横面目。再如，在解放战争时期，每期刊有“半月时事述评”，怎样运用“曲笔”向读者暗示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启示读者认清美帝马歇尔的假调停、真帮蒋，这些都极难落笔，往往数易其稿，要斟字酌句，几番修改，才能定稿。傅彬然先生当时和我共用“炎如”这一个笔名，他在这时期给我的教导是终生难忘的。

《中学生》杂志在政治态度方面是鲜明的。有时，它是代表开明书店出头露面地去打头阵的。据尚丁同志回忆，一九四五年初，党推动重庆杂志界成立联谊会，他去征求叶圣陶先生的意见，叶老当即决定不光是《中学生》而且《开明少年》也参加发起，有力地推动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见《上海出版工作》一九八三年第四期）让我在这里补充一笔，当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重庆各杂志社的负责人在重庆青年会交谊所举行筹备会议时，我随同叶圣陶、傅彬然一起参加，心中是很有感慨的。感慨的是：国民党政府祸国殃民，专制独裁，即使抗战胜利，人民的言论自由还得通过斗争获取。果然，在胜利前夕的八月三日，潘公展约见叶老，指责《中学生战时半月刊》谈政治过多，告诫少谈政治。但叶老、傅彬然先生不为所动。这种老一辈编辑的正直、善良，追求进步，倾向于党的解放事



开明书店出版《二十五史》的书影

业的坚贞品德，是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的。

《中学生》杂志在培养作者方面，也收有成效。当年经常投稿，后来成名的有徐盈、子冈夫妇、胡绳及吴全衡夫妇等。关于读者来稿来信，叶老的爱人胡墨林同志有篇短文谈得很准确。她说：“我一年来大部分在做登记《开明少年》和《中学生》的信件、来稿的工作。复信也大都由我写。”来信“可归纳为（一）诉说自己的痛苦，（二）不满现状，（三）希望我们指导学习，（四）请求我们批改文章。我们对于他们的诉苦和不满，除了表示同情之外，无能为力。至于批改文章，《开明少年》的由叶至善（叶、胡的长子）批改，《中学生》杂志的投稿则因为数太多，而且篇幅又长，只得由王知伊先生在文稿上加一些评语。……不过，有一点，我看他们的来信和来稿，可以说没有一个和我们的思想相反的。我们出这些杂志，可以说得到了“同气相求的安慰。”（见《明社消息》一九四六年十九期）。“同气相求”，这就是说把作者、编者、读者紧紧的扭合在一块了。胡墨林同志说出了《中学生》为什么能在青年

中站得住脚，跑得进学校，受到社会上注目的道理。所以对于开明书店来说，编印《活叶文选》的成功，正是后来试编中学生课本的动机。《中学生》杂志的畅销，是开明以后确定以出版青年读物为方向的契机。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叙述开明书刊时，首先写《文选》和《中学生》的缘故。

开明出版的期刊种数不少，另有《新女性》杂志，它是开明的前身。《文学周报》，是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刊物。《一般》杂志，是立达学会的同人刊物。以上三种，均停刊于一九三〇年前后。

《开明少年》，这是与《中学生》性质相同的杂志，内容较浅，以初中学生为对象。一九三六年创刊，原名《新少年》，由顾均正主编，至“八·一三”战事发生停刊，共出十九期。一九四五年七月在重庆复刊，始改今名，后由叶圣陶主编，回上海后由顾均正、叶至善等主编。截至解放时止，共出四十六期。解放后继续出版。《国文月刊》，以提供中学国文教师教学资料，讨论中国语文为编辑宗旨。创刊于桂林。原为国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编印的刊物，由开明发行。抗战结束后在上海归开明出版，主编是郭绍虞、周予同等，至解放时止，共出四十五期。还有《月报》、《英文月刊》、《地理知识》等。《月报》是一种综合性的十六开的大型月刊，内容选载政治、经济、社会、文学等各方面已发表于报刊上的重要文章，每期刊仅有一、二篇特约稿。这是由胡愈之设计的。创刊于一九三七年，由胡主编。因抗战爆发停刊，共出版七期。《月报》在开明存在的时间短，出得少，但它的影响可不小。自此以后，不少出版社纷纷出版各种形式不同内容不同的“文摘”、“月报”。开明的月报可谓创风气之先。

随着以上各种期刊的出版，开明还相应地出版了一些丛书和讲义，如一九三三年夏丐尊、叶圣陶曾举办过开明函授学校，成立函授学校出版社，依照中学课程，按月寄发各种

讲义，以便利失学青年自学之用。函授学校结束后，就选印国文、英语、数学、历史、地理等十种讲义，单本发行。另如《中学生杂志丛刊》是《中学生》杂志最初五年的选集，共出版了三十余种。这类图书，实际上为出版各种期刊后的副产品，就其形式来说，已不属于期刊范围，就不作介绍了。

（七）青少年读物，古籍和教科书

开明出版的图书，按照各书内容曾经作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分类情况为：文学、艺术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九，语文占百分之十三，自然科学、应用技术占百分之十九，史地占百分之十二，教科书占百分之九，其它为百分之八。如果按照读者来区分，那么青少年读物所占的比重将在总数的四分之三左右。因为开明出版的语文、文学、艺术书以及史地、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等这几个大项目，几乎都能为中学程度的读者所接受。因此，可以说，开明书店的迅速发展，是在千万青少年的热心支持下获得的。

开明书店为青少年出版了哪些受欢迎的书呢？

首先是配合中学各学科学习用的辅导性书籍。如配合语文教学用的夏丏尊的《文章作法》、夏丏尊、叶圣陶合著的《文心》、《阅读与写作》等。又如《开明青年英语丛书》，是专供中学生在课外自修英语用的，内容包括发音、会话、文法、作文等，出了十多种。由顾均正、刘薰宇、贾祖璋等人编写的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普及读物，通俗浅显，饶有趣味。再如蒲韧（胡绳）的《二千年间》，笔调流畅，是一本抗战前难得的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我国历史的书籍，也极受欢迎。其次是大量的新文艺小说，创刊于一九三五年的《开明文学新刊》，包括茅盾、老舍、叶圣陶、巴金、夏丏尊等著名作家的长、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戏剧集，至解放时共出版四十余种。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固然不仅仅受青年读者喜爱，但

其读者群中，青年是占有很大比重的。开我国“五四”以来童话文学先河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叶绍钧著，一九三一年出版），以及丰子恺的多种画册，如《子恺漫画》等，也是受到青少年喜爱的读物。还应提一笔的是由丰子恺、钱君匋编写的音乐图书和歌谱，在抗战前靡靡之音普遍流行的当时，有益于社会风气的改良，也成为当时中小学音乐教课中的良好教材。

开明书店还出版了不少翻译书。其中有直接用以陶冶青少年心情的，也有内容较好的文学作品。前者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亚米契斯著述，由夏丏尊从日文转译出来的《爱的教育》，这是一本畅销书，各地小学都采用为课外辅助读物，十余年中，印行达一百版左右（该书初版在商务发行）。《续爱的教育》的出版，也吸引了不少读者。徐调孚译述的《木偶奇遇记》，是一本很好的外国童话作品。此外，如沈端先（夏衍）翻译的高尔基的《母亲》、耿济之翻译的陀斯妥益夫斯的《白痴》等，也应该说是开明书店给当时青年阅读的好书。至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朱光潜著）等也曾经销行一时。自然，上面所提到的各种青少年课外读物，并非所有的书内容都正确无误，不过，从它们出版的时代来检阅，却大都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教科书在开明出书的比例上，所占比重不大。但从营业额来看，却很惊人。“据一九四九年统计，教科书的营业额占全部营业额的百分之六十二，所以只要春销或秋销一季的营业，就可坐吃半年”（见《开明书店报告》）。在开明早期的教科书中，以林语堂编的《开明英文读本》最为畅销。林语堂这个人的英文很好，是北大教授，原先与鲁迅、孙伏园等都有往来。一九二七年，他在武汉政府当外交部秘书。武汉政府倒台后，寓居上海。他想编一本英文课本赚笔版税吃用一辈子。孙伏园先给他去北新书局接洽，北新因林须每月预支300元版税而拒绝。孙向章锡琛试